

刘萍

著

《论语》

与近代日本

中国青年出版社

《论语》与近代日本

刘萍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与近代日本 / 刘萍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153-3210-9

I. ①论… II. ①刘… III. ①《论语》—研究 ②日本—近代史—研究
IV. ①B222.25 ②K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5427号

责任编辑: 王钦仁

书籍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7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印刷: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7

字数: 190千字

版次: 2015年3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5年3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目录

前言 _ 001

第一章 近世日本《论语》流布概说 _ 005

第一节 《论语》东传日本及其文本流布 _ 007

- 一、《论语》东传日本 _ 007
- 二、《论语》的日本古写本 _ 009
- 三、《论语》的“和刻本”——正平本《论语集解》 _ 010
- 四、结语 _ 013

第二节 “南宗论语”——《天文版论语》述略 _ 015

- 一、《天文版论语》传本概要 _ 016
- 二、《天文版论语》终结本 _ 020
- 三、结语 _ 026

第三节 江户时代汉学家与《论语》 _ 029

- 一、伊藤仁斋与《论语古义》 _ 030
- 二、获生徂徕与《论语微》 _ 034
- 三、结语 _ 038

第二章 近代日本中国哲学思想领域的《论语》研究 _ 039

第一节 服部宇之吉的儒教伦理研究 _ 040

- 一、服部宇之吉的学问倾向 _ 041
- 二、伦理学与东洋伦理中的“孔子教” _ 043
- 三、伦理主义的孔教观 _ 047

第二节 武内义雄与《论语之研究》 _ 053

- 一、关于《论语》文本的厘定——对《论语》文本的究明 _ 054
- 二、关于《论语》的思想史意义上的“原典批评”——对《论语》思想内容的分析 _ 060
- 三、对武内义雄《论语》研究之学术史意义的若干考察 _ 064

第三章 近代日本中国历史学领域的《论语》研究 _ 075

第一节 山路爱山的孔子研究 _ 076

- 一、近代立场的文化批判色彩 _ 077
- 二、《孔子论》的方法论主张 _ 079
- 三、《孔子论》中的“孔子像” _ 088
- 四、《支那思想史》视域的考察 _ 092

第二节 津田左右吉《论语与孔子思想》 _ 099

- 一、津田左右吉对《论语》内容的把握 _ 101
- 二、津田左右吉对“孔子的思想”的诠释 _ 107
- 三、对津田左右吉的儒学批判的再批判 _ 110

第四章 近代日本中国文学领域的《论语》研究

——吉川幸次郎与《论语》 _ 127

第一节 “诚实地理解中国”——关于《论语》的文献整理 _ 129

- 一、博采众家之说，古注、新注并重 _ 133
- 二、尊重清代考据学家注释成果 _ 137
- 三、对日本汉学与近代日本中国学的继承与发展 _ 138

第二节 “中国的智慧”——仁者孔子与文化主义《论语》 _ 143

- 一、仁者孔子 _ 146

二、“文化主义”《论语》 _ 148

三、“革命性”解读 _ 151

第三节 “难以忘怀的读物”——《论语》的辞章之美 _ 154

一、与“文学”《论语》的邂逅 _ 155

二、诗教说与《论语》的文学功能 _ 157

三、《论语》的文学价值 _ 158

第四节 结语 _ 164

第五章 日本近代作家的“论语情结” _ 169

第一节 下村湖人与《论语物语》 _ 170

一、下村湖人的生命历程 _ 170

二、下村湖人的诗歌创作与文学评论 _ 172

三、《论语物语》——围绕《论语》的创作 _ 176

第二节 中岛敦与《弟子》 _ 190

一、短暂的生涯、多姿的色彩 _ 191

二、《弟子》的取材 _ 193

三、《弟子》中的“子路” _ 195

四、中岛敦的孔子像 _ 200

参考书目 _ 205

附录一：近代日本《论语》研究著作目录（1868—1950） _ 211

附录二：『論語物語』—『論語』を巡る日本の近代文学創作 _ 235

后记 _ 259

前言

中日之间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借由特定的地理条件、特殊的人文环境而促其成，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日本对于中国的研究，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业已形成了专门性的学科领域，学界向以“日本汉学与中国学”相称谓。以发生于 19 世纪后半的“明治维新”为界限，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从之前的“日本汉学”时期进入了“近代日本中国学”时期。在欧洲近代文化观念的催生下，日本的中国认识与中国文化观都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点在《论语》的研究史上也得到折射。首先，《论语》所承载的中国儒家学说的基本理念，开始从日本传统意识形态的本体，逐渐过渡为一个“他者”，也即《论语》从曾经的表达日本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存在，变化为一个可以被言说、被讨论的客观对象；其次，讨论的边界日益学科化、体系化，也即《论语》从古来的一部经学文本，开始被分别纳入近代学科体系中加以考量。这一变化似乎于悄然中发生，却绵延了一个多世纪而获得高度发展。

对“近代日本中国学”的样态、特征、学术成就作出回应，

应该成为中国学界的责任担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论语〉与近代日本》或可视为其中的一个个案尝试。作者旨在立足比较文化的立场，就中国古代典籍、儒家经典《论语》东传日本后，在异质文化的土壤中，如何植入再生，如何发生变容，以及如何得到别样诠释等诸样相，作一历史性爬梳。

从传播时间上看，《论语》无疑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作为儒家学派创始者孔子的言谈总录，《论语》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就日本文化发展而言，《论语》也是一部不能被遗忘的文献。《论语》传入日本伊始，即受到极大关注，因应着日本历史上不同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需要，对《论语》的研读、奉习乃至研究，可谓旷日持久，以至日渐深入。这一切自当首先依赖于《论语》文本的广泛传布。从古代至近代，横亘其间的近世时代，是《论语》日本传播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论语》文本完成了从钞本到刻本的发展演进，《论语》日本传播史上最重要的和刻《论语》集解本，至此阶段也已相当成熟和完备。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本学者《论语》注释之作——《论语古义》与《论语徵》。所有这些，为即将到来的近代日本的《论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书第一章即主要围绕这一领域的话题而展开。

《论语》在近代日本的传播呈现出空前未有的态势，对于《论语》的研究也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领域广泛深入地展开，而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又恰恰是与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形成与发展直接相关的。

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形成最早始于“哲学”学科的确立。在日本的中国文化研究史上，中国的儒学文化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日本汉学史就是在对以儒学文

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受容中建构起来的。及至近代，日本对于中国的认识和想象、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评判，尽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于中国儒学的探究，仍然构成近代日本中国学的重要一翼。作为转载儒学文化的重要经典文本之一的《论语》，在近代文化语境下，获得了来自哲学界的新阐释，其中既有将其奉为圭臬的、以服部宇之吉为代表的“孔子教派”，当然亦不乏如狩野直喜、武内义雄等注重文献考订的“古典解释派”。《论语》在日本近代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此番“遭遇”足以使其本身成为重要的东亚近代思想史材料。

在近代日本中国学形成并渐次发展的过程中，原本“捆绑”于经学之中的历史学、文学纷纷挣脱束缚，独立而成近代学科之一门类。在此情形下，原本仅作为经学文献的《论语》，开始进入历史学研究者、文学研究者的视线，成为他们分析研讨的对象。这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有民间史学代表人物山路爱山的孔子研究，也有秉承历史批判主义主张、尝试将儒教理念加以剥离解构的津田左右吉的“儒教批判”，还有以《论语》为方法，实现其“由经学而文学”、阐释中国智慧的吉川幸次郎的《论语》解读。

上述相关问题的讨论，分别构成本书第二、三、四章的核心内容。

与文学独立于经学而成为近代日本中国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日本的近代文学也在与世界发生着深刻的联系而经历着自身的发展蜕变。一部分作家一方面接受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的影响，吸收、模仿西洋近代流派，另一方面，对于浸透于日本历史之中、同时也深深浸透到他们各自生命体验中的中国文化，又怀抱深刻的理解，充满深情的向往。其中如下村湖人、中岛敦便选择以《论语》为蓝本，以《论语》中的孔子、孔门弟子为人物原型，构造其文学创作，以此寄托作家自己的人生理想，阐发其学术思考与追求。

本书第五章即关注到日本近代作家的这一特殊的“《论语》情结”。

近代日本的《论语》研究，折射出日本民族自身近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挑战、激发的论辩和作出的抉择。本书从梳理截至近代之前《论语》在日本的流布概况入手，进而选取近代日本中国学界在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科领域的若干研究成果以及近代日本文学创作领域的相关作品，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就其源于各自不同的立场、视角、学养以及情感体认而完成的《论语》阐释，尝试作出相对客观的清理与解读。书后并附“近代日本《论语》研究著作目录”，以期为读者的深入阅读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

第一章

近世日本《论语》流布概说

《论语》作为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门人言语行事的语录体著作，问世之初只是作为儒家经书的辅翼而流传，至东汉末年，才跃升为经书的一种，南宋时又被朱熹并入《四书》，此后便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读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论语》得以汪洋恣肆地铺陈开来，实应归因于它自身所蕴含的独特的魅力。也正因了这份厚重与深邃，作为最早传入日本的中国典籍，《论语》对于日本自古以来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社会生活乃至经济行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今日，它甚至已经成为日本人精神世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论语》在近代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而言，其前一个时期的近世时代^[1]是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不论是对《论语》文本的抄写、翻刻，还是对原典的切磋研琢，都体现出了承上启下、开风气之先的基本特质。

[1] 日本历史在时代划分上，为与明治时代（1868—1912）以后开始的“近代”相区分，将室町时代织丰期·江户时代（1568—1867）称之为“近世”。

第一节

《论语》东传日本及其文本流布

出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缘故，对日本人而言，只需要用训读的方法就可以直接阅读汉文原典，这实在为《论语》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也为日本学者的《论语》研究奠定了便利的基础。《论语》自 1700 余年前始传日本之后，便作为汉文学与汉文化的重要读本而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天皇宫廷到大和民间直至专家学人，随着《论语》的广泛传播，对《论语》的研究也在不同阶层、不同范围、不同领域潜滋暗长且历久弥坚。

一、《论语》东传日本

《论语》是最早传入日本的中国典籍。

朝鲜半岛自古就是中国文化传播日本的必经之地，《论语》的东传也是如此。在日本最早的两部 8 世纪初的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都留下了关于《论语》东传日本的文字记载。

《古事记》应神天皇十六年：

百济国主照古王……受命以贡上人，名和迺吉师。则是人附《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即贡进。^[1]

[1] 《古事记·祝词》（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1）第 248 页，岩波書店，1969 年。

《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六年：

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1]

上述《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和迩吉师和王仁为同一人，即来自百济的博士，“应神天皇十六年”，学术界则一般推定为公元 285 年。《论语》传入日本的年代与日本历史纪年的估定有着直接的关系，关于“应神天皇年代说”，日本学术界多有异见，且与对《千字文》传入日本的时代判定有着很大关联。^[2]因此，如果我们把《论语》始传日本的年代大致推定在公元 3 世纪末至 5 世纪初，当不会有误。

那么，当时传入日本的《论语》是何种版本呢？这一点因缺乏明确的记载而难以十分清楚明了，不过在后来的大宝令、养老令中，^[3]都提到了《论语郑玄何晏注》，由是可以推知，奈良时代（701—794）流行的《论语》，概为郑玄、何晏注本，此即为《论语》注释史上的所谓何晏《论语集解》本。

[1] 《日本书纪·上》（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67）第 373 页，岩波書店，1969 年。

[2] 落合直澄在《论语千字文贡进时代考》一文中就判定《论语》与《千字文》传入日本的年代为“履仲天皇六年”。另外，关于传入日本的《千字文》，中国学术界亦尚有不同见解，其疑问是关于《千字文》的作者。据历史传说，《千字文》的作者有钟繇说、周兴嗣说、萧子范说。三说各执其辞，而《千字文》原著皆已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和《周兴嗣次韵王羲之书千字》两帖。然据近代书法家张伯英先生精审，此两帖皆系伪作，故而《千字文》作者便莫衷一是了。

[3] 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 年），在大学寮举行了祭孔典礼，同年由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等人模仿唐制撰拟了大宝律令，强调需兼通《孝经》《论语》，并在学令中规定习《论语》应并用郑玄、何晏二注。所谓养老令是在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 年）由藤原不比等等人撰修的。在养老令的学令中，仿照中国唐代的规制，将《论语郑玄何晏注》记入了明经道的科目中。

二、《论语》的日本古写本

《论语》传入之初，并不是作为一般性的读物而主要是在天皇宫中、缙绅、僧侣之间传习，后渐渐发展，开始出现了《论语》的训点和解释，此后便一直作为秘传、秘说在各博士家相沿传衍。根据文献记载可以知道，早自奈良时代开始，日本即已出现了对于汉籍的抄写事业。有关《论语》的最早的古写本即产生于这一时代，当时分为明经道清原家本和中原家本两个系统。

在汉籍不断东传的过程中，《论语》及儒家思想的传播，对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大学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平安朝即仿唐代国子监而设大学寮。在大学寮的建筑里，中央为庙堂，庙堂中安放孔子像，春秋两次行释奠之礼。北设都道院，又名北堂，是纪传道即文章博士的学舍；南设明经道院，又名南堂，是明经博士讲习经学的道场；另设有明法道院及算道院等。纪传道、明经道构成了王朝文化的核心，然仍以家学世袭为其特征，故南堂之学渐渐即为清原、中原两家明经博士所独占，两家各自保留了独特的家法，虽传讲同部经书，如同为何晏《论语集解》本，其中也有种种细微的差别，这种细微的差别源于两家所据的经本不同，训读也不相同，从而显示出了其家法的互异。

平安时代以后，《论语》古写本的流传则尤以清原家为最盛。传世至今最古的《论语》古写本即为清原家教隆本，它是在镰仓时代（1185—1333）四条天皇仁治年间（1232—1246），由清原教隆写定的。清原家派无疑是以古注传经的，但由于时代先后的不同，同为清原家派的写本，经本的变迁与训读的更改也时有发生。至镰仓末期，随着学问僧的频繁往来，朱熹《论语集注》于不知

不觉间传入日本，这自然也影响到清原家派对《论语》的训解和传播。

在清原家派后期门人的著述中，大都折中地征引了朱子《论语集注》。这一点在室町时代（1333—1573）的清原家派门人的著作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室町时代的儒学大宗清原业忠与清原宣贤都是明经道清原家派的门人。清原业忠卒于应永元年（1394年），时年58岁；清原宣贤卒于天文十九年（1550年），时年76岁。但是在清原业忠的弟子天隐龙泽的《论语闻书》以及记录清原宣贤学说的《论语听尘》中，都折中地征引了朱子《论语集注》，足见朱子学影响的渐进。同时，也映现出古代典籍在流传过程中所发生的时代演变。

三、《论语》的“和刻本”——正平本《论语集解》

所谓“和刻本”，特指古代日本翻刻的中国典籍版本。最早的《论语》和刻本与上述清原家教隆本写本大约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这就是刊刻于1247年（日本后深草天皇宝治元年，南宋理宗淳祐七年）的朱子《论语集注》十卷本，称“宝治本《论语》”，又称“陋巷子本《论语》”^[1]但此本今已不传。故现存最早的《论语》和刻本，当为刊刻于1364年（南朝后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的“正平本《论语集解》”。

一般认为，正平本《论语集解》有三种本子：一为双跋本，卷末有“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正平甲辰五月吉辰谨志”、“学

【1】 严绍澍：《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12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古神德楷法日下逸人贯书”双跋款；二为单跋本，卷末只有“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正平甲辰五月吉辰谨志”；三为无跋本，双跋皆无。正平甲辰年即正平十九年。根据“跋文”可知，此版本是堺浦人氏道祐居士命工刊刻的。堺浦乃古泉州的堺地，（今大阪府堺市），是当时日本与中国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堪称外来文化的输入地。然而诞生于此地的这部《论语》刻本，它的享誉后世却是颇费了一番周章。^{〔1〕}

首先发现此书临写本的是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他从曾征讨过朝鲜的辽海道萧公的手中，以重金购得此书，喜之过望，称此本与《史记》《汉书》所引《论语》颇为相合，自云“不啻获一珍船也”。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记录了这一发现经过，对此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笔画奇古，如六朝初唐人隶书碑版，居然东国旧钞。行间所注字，中华罕有识之者，洵为书库中奇本”。并据“末二行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镂梓，正平甲辰五月吉辰谨志’”，判断此本为高丽钞本何晏《论语集解》。只是“不知‘正平’是朝鲜何时年号，俟续考之”。这里的“东国”自是指朝鲜，而“行间所注”中华罕有人能识之字，却实为日本的训点。只是钱氏不解，故欲考之“正平”为朝鲜何时之年号。这一误断后经黄丕烈之手得到了纠正。

经过康熙、乾隆两朝，至嘉庆年间，此书辗转传至当时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手中。黄氏就此本之出处多方加以查考，其经过可见于黄氏所撰之跋文。其跋曰：

……余向于京师遇朝鲜使臣，询以此书并述行间所注字，

〔1〕 高田真治：《论语文献·注释》，春阳堂书店，1937年。